

1980年3月30日,邱岳峰老师突然自杀离世,无数热爱他的人为之深感惊愕和悲痛。

我从不敢去回忆这一幕,即便是三十六年以后的今天,当我坐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家中的电脑前,强使自己去回忆他在世界上的最后几天时,泪水还是会止不住地流下来。

初识邱老师

我从小爱艺术,爱文学,也做过艺术家的梦。“文革”中我中学毕业“上山下乡”,有幸到一个县文工团当了几年演员和报幕员,但因错失了进入专业话剧团的机会,后来又病退回到了上海,无奈只能在街道工厂打工混日糊口。

1976年秋天,我在徐汇区文化馆参加活动几个月以后,话剧班老师把我叫到了一边,悄悄对我说:“小朱,根据我这段时间对你的观察,你要是不回去搞专业真是太可惜了。文化馆最多只能是你练练兵,不会有什么大前途。”老师接着说:“我有一个叔叔,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配音演员,是个非常好的人。前几天我和他提了你的情况,他表示愿意为你免费辅导,但是他说一定要先见见你才能做最后的决定。”

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,感激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更想不到的是,话剧老师的叔叔,是配音演员邱岳峰,这样大名鼎鼎的配音演员,竟然肯收我这既无背景,又无地位,连报酬都付不起的穷女孩做学生,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在梦中。

那是1977年初的一个傍晚,我与话剧老师一起到邱老师家去进行“面试”。“别紧张,自然地表现自己就行了。”话剧老师叮嘱我,“另外,邱老师的家不太大,我们要速战速决。”

邱老师的家离开淮海路陕西路不远,那是在南昌路一条老式里弄的一栋小楼上。我第一次走上楼的

那天,感到楼梯笔直陡峭,而且异乎寻常的黑暗而又狭窄。在楼梯的尽头,是一间仅有十几平方米大小的房间。靠对面墙的角落里,摆着一张低矮的小单人床,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面带倦容斜倚在枕上,这是邱老师的夫人靳雪萍阿姨。一见我们进门,靳阿姨立刻露出了和蔼的笑容,打招呼让我们坐下,邱老师也随之从另一角落迎了出来。

“啊,这就是小朱啊,我们已经听过许多关于你的故事了。”邱老师用他那充满磁性和富有魅力的声音对我说,他那一头银色的白发令我感到父亲般的可亲可近。只不过,他的高高的鼻梁和外翘的下巴,竟完全像是个电影里的外国绅士。

在这之前,哪怕我有再充分的想象力,也绝对不会想到邱老师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,全家六口人竟都挤在这样一个极小的空间里生活,我为自己干扰了别人的正常生活而感到非常的过意不去。

邱老师一定是感到了我内心的局促不安,给我倒了一杯水,然后坐到靳阿姨边上,用非常和蔼轻松的口气对我说道:“好吧,小朱,看看你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什么节目?”

“我想朗诵一段臧克家为纪念鲁迅先生写的诗《有的人》。”

我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和自然,但是,紧曲的手指在掌心里却一个劲儿地冒汗。

我朗诵完了以后,觉得自己的声音是那样的单调浅薄,感情完全不到位,心里也没有一丝自信。

邱老师用两手合拍了一下掌,站起身来对我鼓励地说道:“朗诵得很好,至少比我预计的要好得多。但

赴檀香山。当孙眉了解梁启超这批保皇党人的真面目后,懊悔不迭,迷途知返。他后来决定把在日本大同学校就读的儿子孙昌召回檀香山,不久送其到美国加州学习西医。然而,保皇党的势力和影响在海外华侨中日益扩大,孙中山心急如焚。

1903年10月,孙中山为了夺回被梁启超破坏殆尽的檀香山兴中会阵地,从日本再到檀香山。

他奔走演讲,揭露梁启超所鼓吹的“名为保皇,实则革命”的谬论和施展的欺骗伎俩,号召同胞“毋惑保皇,奋起革命”。

然而,保皇党在檀香山势力强大,影响广泛,其机关报《新中国》刊文极力诋毁革命,并大肆攻击孙中山。孙中山此时又依靠大哥和郑金等坚定分子的支持,把兴中会会员程蔚南主办的《檀山新报》改组为党报,亲自撰写论文,向保皇派展开论战,先后发表具有正本清源作用、产生深远影响的《敬告同乡书》《驳保皇报书》。通过一番激烈的较量,革命党的力量重新在檀香山确立地位,广大华侨终于明白保皇与革命是两回事,误入保皇党者又纷纷退出。

这期间,孙中山去茂宜岛与家人团聚。当时不少亲友都知孙中山精通医术,每逢患病,总是前来求医。开始孙中山以此道久已荒疏而婉拒,但孙眉却说,你既然是医生,为何还要推辞?孙中山就遵兄命为患者义务诊治,结果,“就诊者莫不着手回春,众咸深为惊奇”,深得侨胞的敬仰和信任。

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通过这件事,不禁触景生情,语重心长地对孙中山说:“革命目的在救人,行医目的亦在救人,同是救人,何必东奔西跑,自寻烦恼?”这时,在一旁的孙眉为孙中山解围道:“行医只能救少数人,革命则能救多数人,吾弟奔走革命多年,自应始终一贯,岂可轻易变更,前功尽弃。”大家都觉得孙眉的话十分在理,从此,杨太夫人再也不劝阻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四海漂泊了。

孙中山在檀香山深得大哥孙眉的鼓励和支持,更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。他创立“中华革命军”组织,发行军需债券,募集革命经费。军需债券票额为美金10元,待革命成功后,凭该券还本息百元。



邱岳峰

是,还有许多段落是需要重新调整你内心感情尺度的。声调还可以更低沉、更自然一些。”

“叔叔,这是不是意味着你是愿意收小朱做学生了?”话剧老师问出了我的心里话。

邱老师低头想了一下,平静地对我说:“我工作很忙,空余的时间并不多,但是,如果我的帮助能够改变你的现状,我是会尽自己所能的。”

邱老师的话顿时如一股暖流淌过了我的心房。

在那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只要邱老师能有一点空余的时间,我就会到他家里去上课。

在我的记忆中,邱老师平时话不太多,是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、连一个错误音符都不会放过的严格良师。他对我当时在个人成长中的每一步,都给予了非常及时的校正和指导。

因为经常来邱老师家上课,渐渐地我也和阿姨以及他们的四个孩子熟悉起来。邱老师的大儿子邱必昌好像大我几岁,个子不高,却是满头金黄色的头发,眉眼之间比邱老师更像外国人。我们大家都笑称他“黄

◆ 朱玲

毛”。邱老师有三个儿子,一个女儿。他非常钟爱的女儿,当时还在外地农场里调不回来。每一次提及他的女儿,都会有一片乌云瞬间浮上他的眉头,眼睛立时充满了说不清的哀怨。我从不敢问这其间的缘由。他待我如此亲切,我感觉到他是在把我当女儿一样诚挚地关心帮助我。

相处久了,他们全家都已不把我当外人,邱老师和阿姨都开始昵称我的小名“玲玲”。

最使我高兴的是,我还经常可以从他那里拿到一些“内部电影票”。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食粮都奇缺的年代,这是我生活中最最快活的一部分。

“就当是一次练兵”

在1977年—1978年中的那段时间里,除了为我辅导以外,邱老师还和我的父母一起不断地分析讨论着,看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,才能改变我目前的状况,让我重新回到舞台。

“我觉得你再去考戏剧学院的希望不大,因为要去和那些刚出茅庐的年轻、漂亮的女孩子竞争,可能太困难了。等你学出来再搞专业也太晚了!再说,学习期间谁来养活你?”邱老师对我家的情况非常了解,说得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。

“我认为最合适的还是部队文工团。最好是话剧团。而且,你已经有了六七年的舞台经验,一到部队就能施展你的能力,他们也需要你这样可以立刻工作的人。”邱老师紧接着又说,“最重要的一点,将来回上海就会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,让这个卡住你喉咙的小集体制见鬼去吧!”

他笑着像说台词那样地有声有色,用双手做着紧卡脖子状,像个调皮的孩子那样伸出了他的长舌头,逗得我们大家都大笑不止。

爸爸也非常同意邱老师的观点。但是,像我们这样毫无背景的人家,怎样才能找到部队的门路呢?

“你就将这件事交给我吧!”邱老师对我爸爸说,“最近全国各地的部队文工团都经常来上海招人,我在行业里还是有些熟悉的人,我会替玲玲留意的,请放心!”

那段时间,通过徐汇区文化馆老师的推荐,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话剧团的导演苏若慈老师,破例收我参加剧组的排练演出。当时话剧《于无声处》红极一时,我被分到B组。同时还在排练话剧《约会》,扮演一个与我的外表和内心都截然相反的娇小姐的角色。

1978年中的一天,邱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,他说:“听说福州军区话剧团到上海来招生,考场就设在上海沧州饭店。你应该去试一下,我们做个准备吧!”

盼望了一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,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。邱老师可比我平静多了,只是比平时更严格地帮助我准备考试的小品。

“心里不要有一丝杂念,就当是一次练兵!考不上也没关系,将来还有的是机会!”

我把这些话都牢牢地刻在了心里。

那天考场的周围挤满了人群,有来陪同的戏剧学院的老师和他们的学生,有父母陪伴的亲子爱女。唯有我,独自一人站在角落里,全神贯注地在内心准备着考试的内容。

也许是只当一次练兵,我在考场上异常放松。我朗诵了一段邱老师为我辅导的诗,又表演了一段自编的即兴小品。还没有仔细地观察一下考官的神态就匆匆离去了。

细说孙中山家族

沈飞德



11.识破欺骗伎俩

梁启超深知人心可用,便加入洪门组织(致公堂),在华侨中打着“名为保皇,实则革命”的幌子,以“拥护清帝变法维新,足以保护海外侨民权利”蛊惑人心。孙眉和兴中会会员以及广大华侨信以为真,纷纷加入保皇会。在极短的时间内,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纷纷变成了保皇会会员,原来革命派的阵地一夜之间变成了保皇派的地盘,只有郑金、郑照、李昌、程蔚南、许直臣、何宽、李安邦等十多人不为迷惑。尤其由于孙眉慷慨解囊捐助大笔经费,以及他的号召,梁启超不仅在那里创办了保皇会机关报《新中国》,还募得了10多万元巨款。

远在日本的孙中山很快识破了梁启超在檀香山借助于大哥美言感众、欺瞒敛财,写信气愤地责备梁启超失信背约,并力劝大哥孙眉他们不要继续受梁的愚弄。但当时孙眉和檀香山的绝大多数兴中会会员,“受毒已深,久未觉悟”,仍对梁启超所谓的“南方预备既足,亦指日起事,此诚今日最大机会也”等谎言深信不疑,继续积极为其筹款。

1900年8月1日,梁启超写信给孙眉,在“阁下尊为公事,既已如此出力,复多所馈赠,于弟诚不敢当也”一番恭维后,介绍几天前在大埠兴中会会员踊跃捐款6000余金的盛况,说“人心如此,大事何患不成?”极力鼓动孙眉,意在催促“望各同志即将汇款迅速收集,急需汇归,以应急需,是所切盼!”8月11日的信,梁启超在最后还是谈筹款,“至于令侄及各同志捐项,仍望赶收赶汇,因唐山急催弟归,其事机之急可知,其需款之急可知矣”。

孙眉对梁启超信任有加,令其子孙昌、侄孙科拜梁启超为师,并命孙昌侍随梁启超到日本,入康有为门徒创立的大同学校读书。

孙中山深感檀香山“华侨误入保皇党者颇众,故保皇势力盛极一时”,尤其是连自己的大哥也误信成为保皇会的积极分子,心情十分焦急。1901年4月,孙中山由日本横滨

13.校园伴侶

嘉毅的学校里经常举办舞会。罗小微找到他,说邀他晚上一起参加学校的舞会。嘉毅见难以推托,心想就算消磨时间,陪她一起去看吧,便答应了她。

学校的舞会一般由学生会组织,办在学校的小食堂里,把白天使用的饭桌移到四周,在饭桌的外围放了一排椅子,腾出中间的地方作为舞池。

嘉毅和小微来到小食堂,已经有不少同学了,平时好动调皮的男同学或因胆怯,或因舞技差而变得彬彬有礼,不敢轻易向女生发出邀请,大多数同学只在舞池周围观看,即使跳舞也仅围着舞池周边,舞池中央很少有人跳。只有一对舞伴在舒展动人的华尔兹旋律下,跳得非常富有节奏,滑步流畅,摆荡自如,旋转潇洒,舞技炉火纯青,两人配合得浑然一体。

当这对舞伴走向舞池边缘时,嘉毅看清男生就是同宿舍的苏建。小微拉了拉他的手臂问道:“你认识跳舞的那对舞伴吗?”嘉毅说:“男生是我同宿舍的苏建,是历届生,大家叫他书记。”小微又问:“你认识和他跳舞的女生吗?”他记起来了,那个女生就是自己刚刚进学校时,一天晚上在宿舍门口见到的,便说:“不算认识,只见过一面。”

小微瞟了他一眼说:“看来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她是书记的女朋友,是他同班同学,叫陆文晴,很漂亮吧?也算得上校花之一,崇拜她的傻小子不少。”

他们的话说到这里时,苏建和陆文晴来到他们面前,苏建客气地和嘉毅打了招呼,问道:“你们跳舞了没有?”陆文晴在苏建的身后,很有礼貌地向他们微笑一下,算是打了招呼。

嘉毅坦白地说:“我们都不会跳,只是凑热闹,来看看而已。”他指了指小微,又补了一句,“她可能会跳一点。”苏建就像一位很有亲和力的大哥似的,朝陆文晴说:“时间还早,我们各自带他们跳一曲吧。”

舞会进入了后半场,舞池里跳舞的人开始多起来了,在斑斓的灯光下,很难看清人的脸,平时认识的同学也变得难以辨别了,小微努力地辨别她认识的同学,并小声地向嘉毅作

着介绍,显示出她广泛的交际。这时迎面过来一位男生,向小微发出跳舞邀请,她转身朝嘉毅微微一笑,没有说话,随那位男生进入舞池。

舞曲还没有结束,就见小微和那个男生已经下来了,男生将小微送到嘉毅面前,在离开时很有礼貌地向小微鞠了一躬。

嘉毅凑上去小声问:“怎么这么快就下来了?”她摇摇头说:“他呀,上去就踩了我两脚,跳得比你还差,没办法跳。”嘉毅大笑起来说:“竟然会有比我跳得更差的吗?还是人家在你大美女面前紧张了,才踩着了你的脚,你还要责怪人家,那真是太不领情了。”

小微对他的调侃并没有生气,反而向他介绍起这位同学:“他叫何麒,其实他人还不错,只是有点笨、有点自卑。可能认为自己是小地方来的,读书也不太用心,老是惦记着自己所谓当官的儿子,莫名其妙地认为自己有优越感,或者曾经有过的优越感,好像在学校里很不能适应。”

星期六下午,嘉毅像往常一样回家,姐姐佳敏还没有回来,只有奶奶在家。由于佳敏中学毕业,被分配去了上海近郊农场,家里吃晚饭只有他和奶奶、母亲还有佳敏四人。

晚饭后,嘉毅的母亲将父亲平反的消息告诉了大家:“几个月前跟你们说过的,你们父亲平反的事情总算有了正式的结果,他们今天又叫我去了,说当年的隔离审查,现在定性为属于政治迫害,又对我说了一大堆大道理,应该相信组织是公正的,在这场政治浩劫中,受害的也不是你们一家,说还要听取我们家里人对补偿的意见。我心里很痛,你们父亲人走了,再也回不来了,补偿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。”她顿了顿,向佳敏和嘉毅扫了一眼,又深思熟虑地以平静的口气说,“以前我们家里受的苦,受的罪,给你们孩子造成的阴影,也不是能用钱可以弥补的,但我们的日子不能不过。我想我们也不要什么钱,让他们把你们姐姐从崇明农场调上来,在你们父亲的单位里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,免得佳敏在那里再受苦,我们一家人也能团团圆圆。我想你们父亲要是有在天之灵的话,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七九届高中生

宋坚雷

